

新闻工作 文献选编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

新华出版社

马 克 思

《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节录)*

《莱比锡总汇报》在全普鲁士境内的查封

科伦12月31日。德国的报刊在看来是阴暗的预兆下进入新的一年。《莱比锡总汇报》最近刚刚在普鲁士国家各省被封这一事实，足以打破轻信者对行将来临的巨大让步所抱的各种扬扬自得的幻想。在萨克森书报检查制度下出版的《莱比锡总汇报》是由于讨论普鲁士的问题被迫停刊的，这就告诉我们不要再想不受检查地讨论我们的内部问题了。这个结论是从事实中得出来的，谁也不会否认它。

加在《莱比锡总汇报》头上的主要罪状大约如下：

“该报只报道一些传闻，后来发现这些传闻至少有一半是捏造的。此外，该报不满足于断定事实，而且还要追根究底。尽管该报的见解有时是错误的，但它总是十分自以为是地而且往往带着恶毒的激情来发表这些见解。轻浮、‘不谦逊’、‘幼稚’乃

-
- * 由于在萨克森出版的《莱比锡总汇报》刊登了海尔维格批评普鲁士国王的一封信，1842年12月28日，该报在普鲁士境内遭到查禁。马克思为此写了这组（共七篇）文章，抗议普鲁士专制政府迫害进步报纸。这里选了其中的三篇。这组文章，较系统地表达了马克思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阶段的主要新闻观点。

是该报全部行为的特色，一言以蔽之，该报行为不端。”

假定所有这些罪状都是有根有据的，那末，试问这些罪状是用来反对《莱比锡总汇报》的**任性**呢，或是用来反对方兴未艾的、年轻的**人民报刊的必然性**呢？问题是关于仅仅**某一类**报刊的存在呢，还是**真正的**报刊即**人民报刊**的不存在？

法国的、英国的、以及所有的报刊，在其存在的初期都表现出德国报刊的那些特征，而每一种报刊也都受到德国报刊曾经受到的那些指摘。报刊只是而且应该是**有声的**、“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诚然有时这种表达是热情的、夸大的和荒谬的”。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报刊始终是在形成的过程中，在报刊上永远也不会有终结的东西。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它尖锐地、激情地、片面地（象当时激动的感情和思想所要求的那样）对这些东西做出自己的判决。今天它所报道的事实或所发表的见解中的错误之处，明天它自己就会推翻。它体现出那种本来意义上的“独特的”方针，这种方针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报刊的敌人也是很喜爱的。

最近不断向年轻“报刊”发出的种种责难是相互排斥的。他们说道，请看看吧，**英国和法国**的报刊所执行的方针多么坚定、彻底和明确。这些报刊在生活中有着牢固的支柱，它们的观点就是**现存的、完全成熟了的**社会势力的观点。它们并不强迫人民去接受任何学说，它们自己便是人民及其党派的真正学说。而你们并不表达人民的思想和利益，你们只是**捏造**这些思想和利益，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只是偷偷地把它们塞给人民。你们创造政党的精神，而不是这种精神创造了你们。可见，他们忽而责备报刊没

有政党，忽而又责备报刊想弥补这种缺陷创立政党的愿望。显然，凡是报刊年轻的地方，人民的精神也就年轻，而刚刚觉醒的人民精神大声表达出来的日常政治思想，也就没有在政治斗争中成长壮大并自觉了的人民精神的政治思想那样成熟、定形和周密。首先，刚刚具有政治觉悟的人民对某一事件的**事实**可靠性不象对这事件的**道德**实质（事件通过道德实质来表现自己的行动）那样关心。这是事实或是杜撰，——而事件却始终是人们的思想、恐惧和希望的具体表现，是**真实**的叙述。人民看到自己这种本质在它的报刊的本质中反映出来，如果它看不到这一点，它就会认为报刊是某种**无关重要的**和不值一看的东西，因为人民不让自己受骗。所以，纵令年轻的报刊每天都在戕害自己，纵令恶劣的激情渗入报刊，人民还是通过它才得知自己的情况。人民知道，报刊尽管受到敌意和轻率的毒素的毒害，但报刊的本质总是真实的和纯洁的，这种毒素会在报刊的永不停息的滚滚激流中变成真理和强身健体的饮料。人民知道，它的报刊为它担当了各种罪过，并准备为它和它的荣誉忍受一切屈辱；它的报刊正在抛弃傲慢的外表以及自满和武断，成为现代荆棘丛中一朵伦理精神的玫瑰花。

所以，我们应该把对《莱比锡总汇报》的种种责难看做是针对年轻的人民报刊、因而也就是针对真正的报刊的责难。十分明显，报刊不经过渊源于其本质的必然发展阶段，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报刊。我们应当把对人民报刊的指摘看做对人民政治精神的指摘。虽然如此，我们在本文的开头还是把对于德国报刊的预兆只描绘成**看来**是阴暗的预兆。事情也正是这样，因为反对任何一种现象的斗争都是这一现象得到认可和这一现象的现实性与力量的**最初形式**。所以只有斗争才能使政府和人民（甚至报刊自己）

相信报刊具有真正的和必然的存在权利。只有斗争才能表明，报刊的存在究竟是一种让步或是必要，是幻觉或是真实。

《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和《科伦日报》

科伦 1 月 3 日。《科伦日报》在 12 月 31 日发表了一篇注有“莱比锡 27 日”字样的通讯，这篇通讯几乎是用一种欢呼的声调报道了《莱比锡总汇报》被封的消息。可是在昨天这里收到的《国家报》上，封闭这家报纸的内阁法令的日期却是 12 月 28 日。只要确定《莱比锡总汇报》被封的消息是 12 月 31 日从这里的邮局收到的这一事实，就能解开这个谜。显然，《科伦日报》认为不单可以捏造通讯，而且还可以捏造通讯记者，并且用自己的声音冒充光荣的莱比锡市的声音。《科伦日报》的“唯利是图的”幻想“巧妙地”混淆了概念。这种幻想把《科伦日报》报馆搬到莱比锡去了，因为《莱比锡总汇报》已不可能设在科伦。如果《科伦日报》编辑部在比较冷静的考虑之后，还妄图用自己的幻想把戏来冒充冷酷的真事实情，那末我们就不得不再报道一件与这篇神秘的莱比锡通讯有关的事实了，这件事实

“完全越出了礼貌的界限，甚至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中庸而慎重的人都认为太不谦逊了”。

至于说到《莱比锡总汇报》被封这件事，我们已发表了我们的意见。我们承认《莱比锡总汇报》被指摘的所有那些缺点并不是纯粹捏造的。但我们认为是人民报刊的实质本身所产生的一些缺点。因此，如果人们打算容许发展本身，那就应该象容许发展中的毛病那样容许这些缺点。

《莱比锡总汇报》并不是整个德国人民报刊，但它是这种报刊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在人民报刊正常发展的情况下，总合起

来构成人民报刊实质的各个分子，都应当（起初是单个地）表现出自己的**特征**。这样，人民报刊的整个机体便分裂成许多各不相同的报纸，它们具有各种不同而又相互补充的特征，例如，一家报纸如果主要关心政治学，另一家则主要关心政治实践，一家如果主要关心**新思想**，另一家则主要关心**新事实**。只有在人民报刊的各个分子都有可能毫无阻碍、独立自主地**各向一面**发展并各成一行的条件下，真正“**好的**”人民报刊，即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的人民报刊才能形成。那时，每家报纸都会体现出**真正**的伦理精神，就象每一片蔷薇花瓣都表现了蔷薇的特质并散发出蔷薇的芬芳一样。但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不应该从外部施加任何压力，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为我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种规律它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由于专横暴戾而丧失掉。

好报刊和坏报刊

科伦1月5日。关于“**好**”报刊和“**坏**”报刊的区别，我们已经听到过一些抽象的言论。现在我们要用具体例子来说明这种区别。

《爱北斐特日报》在1月5日注有《爱北斐特》字样的一篇文章中自评为“好报刊”。《爱北斐特日报》1月5日报道了这样一段消息：

“柏林12月30日。此间对《莱比锡总汇报》被封一事，整个说来没有什么反应。”

相反地，《杜塞尔多夫日报》却和《莱茵报》一样，它报道说：

“柏林1月1日。《莱比锡总汇报》被断然查封一事，在这

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因为柏林人都非常喜欢读这份报纸”等等。

究竟什么样的报刊（“好的”或“坏的”）才是“真正的”报刊？谁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谁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呢？谁在表达社会舆论，谁在歪曲社会舆论呢？因此，谁应该受到国家的信任呢？

《科伦日报》的解释不能使我们满意。我们曾责备它“几乎是用欢呼的声调”来报道《莱比锡总汇报》被封的消息，而它在我们这一批评的答复中不仅谈到**有关日期**的问题，而且还谈到刊误的问题。《科伦日报》自己明白，“只要确定《莱比锡总汇报》被封的消息是12月31日从这里的邮局收到的这一事实，就能解开这个谜”这句话中的日期应该是（只是由于刊误才不是）“12月30日”。《莱茵报》，还有《科伦日报》正是在12月30日中午（必要时我们可以证实这一点）从这里的邮局收到这个消息的。

写于1842年12月31日—1843年1月15日

载于1843年1月1—16日《莱茵报》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恩 格 斯

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节录)·

海因岑先生号召立即举行起义。他本着这个精神印刷传单，竭力在德国散发。试问：这种肤浅的、盲目的、毫无意义的宣传对德国民主派不是极其有害吗？试问：难道经验没有证明这种宣传是毫无补益的吗？难道在德国的大动荡时期即30年代，没有散发过几十万份类似的传单、小册子吗？难道其中有一份取得什么成效了吗？试问：难道会有一个头脑多少还正常的人能够认为人民对这种政治说教将予以丝毫重视吗？试问：海因岑先生的传单除了说教以外，什么时候还做过别的事情吗？试问：不经过冷静思考，不了解也不估计实际关系，就向全世界大声宣称自己的各种革命号召，这岂不荒唐吗？

党刊的任务是什么呢？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驳斥和推翻敌对党的妄想和论断。德国民主派刊物的

-
- 1847年9月，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卡·海因岑在《德意志—布魯塞爾報》上发表文章，攻击共产主义者及其理论，为了回答他的挑战，恩格斯写了这组文章（共两篇）。这是第一篇的摘录。在这里，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的报刊和德国民主派报刊的任务和对党的政论家的要求。

任务是什么呢？就是从以下各个方面证明民主制的必要性：目前这种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贵族利益的管理方式是不中用的，将使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里的立宪制度是不完备的，人民只要不掌握政权就不可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因此，这种刊物应当说明，无产者、小农和城市小资产者（因为在德国，构成“人民”的正是这些人）为什么受官吏、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压迫；应该说明，为什么会产生不仅是政治压迫而且首先是社会压迫，以及采取哪些手段可以消除这种压迫；它应该证明，无产者、小农和城市小资产者取得政权是采取这些手段的首要条件。其次，它应该探讨，立即实现民主制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党有哪些手段可以采取，当它还很软弱不能独立活动的时候，它应当联合哪些党派。所有这些任务，海因岑先生完成了一项吗？没有。他根本没有花费精力这样做。他没有向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城市小资产者说明任何问题。他从来没有研究过各阶级和党派的情况。他所做的，就是在“揍它，揍它，揍它！”这个题目上玩弄花样。

.....

这就是海因岑先生的整个鼓动活动；我们公开声明，我们认为这种鼓动对整个德国激进派肯定是有损害的，是有损它的声誉的。党的政论家应当具备完全不同于海因岑先生（前面已经指出，他是本世纪最无知的蠢汉之一）所有的品质。海因岑先生也许满脑子都是最善良的愿望，他也许是全欧洲信念最坚定的人。我们也知道，他本人诚实、勇敢、坚定。但要成为党的政论家，单有这些还是不够的。除了一定的信念、善良的愿望和斯腾托尔的嗓子而外，还需要一些别的条件。就海因岑先生现在具有的和多年经验证明他能够具有的各方面的条件来说，党的政论家需要更多的智慧，思想要更加明确，风格要更好一些，知识也要更丰富

些。

写于1847年9月26日

载于1847年10月3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300—301、304页

马克思 恩格斯

《新莱茵报》审判案(节录)·

马克思的发言

诸位陪审员先生，一般说来，如果你们要象检察机关所解释的那样，把关于诽谤的第三六七条运用于报刊，那末你们借助刑事立法就可以把你们在宪法中所承认的和通过革命才取得的出版自由取消。这样你们就是批准官员们的恣意专横，给官方的一切卑劣行为大开方便之门，专门惩罚对这种卑劣行为的揭露。既然如此，何必还要虚伪地承认出版自由呢？如果现行法律和社会发展刚刚达到的阶段发生显著的矛盾，那末，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的职责恰恰就是要在过时的律令和社会的迫切要求的斗争中讲出自己分量的话。那时你们的任务就是要超过法律，直到它认识到必须满足社会的要求为止。这是陪审法庭的最高尚的特权。诸位先生，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文字本身就便于你们执行这个任务。你们只是应当根据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政治权利、我们的社会要求来解释它。

-
- 1849年2月7日，科伦陪审法庭开庭审理关于《新莱茵报》发表《逮捕》一文，侮辱检察长和诽谤宪兵的案件。法庭最后宣布所有被告无罪。马克思恩格斯在法庭上做了辩护发言，他们的发言于当年春天和1885年10月两次印成小册子出版。

第三六七条结尾说道：

“本规定不适用于法律允许公布的行为，也不适用于控诉人由于其职务或职责必须加以揭露或阻止的行为。”

诸位先生，毫无疑问，当立法者谈到揭露的**职责**时，他指的不是自由报刊。但是，他同样也很少想到，这一条有一天会被运用于自由报刊。大家知道，在拿破仑统治下是没有任何出版自由的。因此，如果你们想把这条法律运用于完全不是为此而制定的这种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阶段，那你们就把它**全部**运用起来，按照现代的精神来解释它，使第三六七条的最后一句也施惠于报刊。

如果按照检察机关对第三六七条所作的那种狭隘的解释，那末这一条就排斥了对真理的证明，只允许根据官方文件或者已经做出的法庭判决来进行揭露。如果是这样，那何必还要报刊放马后炮，在已经宣判之后来揭露呢？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如果你们这样来解释第三六七条——其实，如果你们不想为了政府当局的利益取消出版自由，你们就应当这样来解释它，——那末法典同时也给你们提供了反对报刊滥用职权的武器。根据第三七二条，如果某人进行揭露，那末对他的司法上的追究和关于是否诽谤问题的判决必须延期进行，直到对所揭露的事实调查清楚为止。根据第三七三条，属于诽谤性的揭露要受到惩罚。

诸位先生！只要粗略地看一看被指控的那篇文章，就可以确信，《新莱茵报》抨击地方检察机关和宪兵，毫无侮辱或诽谤之**意**，它只是在履行它的揭露职责。对证人的讯问已经向你们证明，我们关于宪兵所报道的完全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

诸位陪审员先生，坦率地说，如果普鲁士的人民革命不立刻粉碎普鲁士的反革命，那末在普鲁士也将完全取消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我深信我的话是正确的。由于实行戒严，这种自由现在就已被部分地取消了。在杜塞尔多夫和西里西亚的某些地区，有人竟敢恢复了**书报检查制度**。

但是，不仅德国的一般情况和普鲁士的一般情况使我们有责任抱着极端不信任的态度去注视政府的每一个行动，去公开揭露政府所采用的制度的任何一个微小的症状。科伦的地方检察机关也给我们提供了特殊的理由，使我们把这个检察机关作为反革命的工具在舆论面前揭露出来。在7月一个月里，我们就不得不揭露了三次非法逮捕事件。前两次国家检察官黑克尔保持了沉默。第三次他企图为自己辩解，但是在我们进行了回击以后，他便哑口无言了。理由很简单：他没有什么可说的。

在上述情况下，检察机关敢于断言我们在这样的场合不是在进行揭露而是在进行吹毛求疵的恶意诽谤吗？这样的观点是以某种奇怪的误解为基础的。至于我本人，诸位先生，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宁肯去研究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宁肯去分析历史的进程，也不愿意同当地的要人、宪兵和检察机关打交道。尽管这些先生们以为自己很伟大，但在现代的巨大斗争中他们却**算不了什么，根本算不了什么**。如果我们决定同**这样的**敌手交锋，我认为，从我们这方面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牺牲。但是首先，报刊的义务正是在于为它周围左近的被压迫者辩护。此外，诸位先生，直接同个人、同活的个体及其个人生活发生接触的下级政权机关和社会权力机关是奴隶制度这一建筑的主要支柱。所以，只是一般地同现存关系、同最高权力机关作斗争是不够的。报刊

必须反对**某一具体的宪兵、某一具体的检察官、某一具体的行政长官**。为什么**三月革命**会失败呢？三月革命只是改组了政治上层，而没有触动它的全部基础：旧官僚制度、旧军队、旧检察机关和那些从生到死终身为专制制度服务的旧法官。目前报刊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现存政治制度的一切基础**。（听众发出叫好声。）

恩格斯的发言

陪审法庭的特权是：陪审员可以不依赖传统的审判实践解释法律，而按照他们的健全理智和良心的启示去解释法律。根据第三六七条对我们提出控诉，是因为我们指责这些宪兵有下面这种行为：如果这种行为确已发生，就会引起公民对他们的鄙视和憎恨。如果你们按照检察机关的意旨解释“憎恨和鄙视”这两个词，那末，只要第三七〇条还有效，出版自由就会完全被取消。在这种情况下，报刊怎么能履行自己的首要职责——保护公民不受官员逞凶肆虐之害呢？只要报刊向舆论揭露这种逞凶肆虐的行为，就要受到法庭的追究，而且如果按照检察机关的愿望办事，还要被判处徒刑、罚款和剥夺公民权；只有下述情况例外，即报刊可以公布法庭判决，就是说，只有当揭露已经失去任何意义的时候，才能进行揭露。

和第三六九条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上述法律条款（至少是根据检察机关的解释）是多么不适合于我们今天的情况。第三六九条规定：

“至于通过外国报纸而成为举世周知的诽谤，凡将这些文章寄往报社者……或协助这些报纸运入国内和在国内散发者，均应交付法庭审判。”

诸位先生！根据这一条法律，检察机关就必须每日每时把普鲁士王国的邮政官员交付法庭审判。难道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有哪一天普鲁士邮局不在由于递送某种外国报纸而协助“运人和散发”检察机关所认为的那种诽谤吗？但是，检察机关并没有想到对邮局提出控诉。

其次，诸位先生，请你们注意，这些条款是在这样的时候制定的：当时由于实行书报检查制度，在报刊上不可能对官员进行诽谤。因此，按照立法者的意思，这些条款应该是防止对私人而不是对官员的诽谤，这些条款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意义。但是，自从获得出版自由时起，官员的行为同样可能成为举世周知的事情；这就根本改变了整个情况。正是现在，当旧的法律和新的社会政治情况之间存在着这种矛盾的时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陪审员应该挺身而出，对旧的法律作新的解释，使它适合于新的情况。

.....

请问，如果有人说一个普鲁士王国的宪兵喝酒有些过度，这对他来说，有什么了不起呢？这能不能叫做诽谤？关于这一点，我愿意向全莱茵省的舆论界请教。

.....

我们的罪行就是正确地指出了确凿的事实并从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而为了对这一罪行负责，今天我们出庭受审。诸位先生，整个案件实际上不就是这样的吗？

总之，诸位陪审员先生，此刻你们必须在这里解决莱茵省的出版自由问题。如果禁止报刊报道它所目睹的事情，如果报刊在每一个有分量的问题上都要等待法庭的判决，如果报刊不管事实是否真实，首先得问一问每个官员——从大臣到宪兵，——他们

的荣誉或他们的尊严是否会由于所引用的事实而受到损伤，如果要把报刊置于二者择一的地位：或是歪曲事件，或是完全避而不谈，——那末，诸位先生，出版自由就完结了。如果你们想这样做，那你们就宣判我们**有罪**吧！

演说于1849年2月7日

载于1849年2月14日《新莱茵报》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274—278、280—285页

恩 格 斯

就《工人报》改为日报一 事给奥地利工人的贺信^{*}

在每一个党、特别是工人党的生活中，第一张日报的出版总是意味着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是它至少在报刊方面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这个阵地你们已经为自己占领了；现在的问题是要占领第二个阵地：选举权、议会。如果你们能以最近十五个月内所显示的那种才能来利用日益有利于你们的政治形势，如果你们善于及时地采取坚决行动，可是又同样及时地（这常常是必要的）等待时机，也就是使情况对你们有利，那末在这方面你们也能保证取得胜利。

祝每日出版的《工人报》顺利和成功。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载于1895年1月1日《工人报》

1894年12月27日于伦敦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590页

-
- 《工人报》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维也纳出版的机关报，1895年元旦改为日报。